

明末北京城市筆記與都城文化記憶 ——以《帝京景物略》的創作、評論、 傳播為中心

馮乃希*

〔摘要〕

1635年出版的《帝京景物略》是記敘北京歷史文化的重要城市筆記。它由明末文人獨立完成，系統記錄城市名勝史跡、風俗物產，是明代規模最大、成書最晚的作品。此書以深幽孤峭、冷峻奇詭的文風享譽後世文壇，被尊為明清小品文之經典。考察北京城特殊政治地理區位及作者寫作動機和過程，可見《帝京景物略》綜合城市史料與散文文學的雙重性質，體現王朝末年文學創作與史學書寫的結合。晚明作者通過改寫奇跡異聞回顧王朝歷史，同時傳達對現實的批判和對末世的擔憂。但在明末以降至20世紀的流傳過程中，後世評論者從自身所處的歷史政治背景出發，重塑文本形態，闡釋文本意義，在此過程中，都城文化記憶和晚明作者的歷史批判意識被淡化，該書文本性質轉化成今人熟悉的「小品美文」。

關鍵詞：北京、城市筆記、竟陵派、文化記憶

* 北京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前言

北京，作為中國古代都城的歷史接近千年。從遼南京、金中都，到統一帝國形態下的元大都、明北京和清北京，這座城市經歷了巨大的社會文化變遷。¹然而，宋元時期，北京地區直屬契丹（遼）、女真（金）、蒙古（元）這些非漢族政權管轄，除《析津志》（14世紀）等地志和樓鑰（1137-1213）《北行日錄》（1169）、范成大（1126-1193）《攬轡錄》（1170）等零散日記、筆記外，以北京為主題的著作數量甚少。²直到明朝（1368-1644）末年，對北京歷史文化的系統敘述才逐步確立，這一古老都城的獨特文化形象在帝制晚期中國文化版圖中漸漸明晰。明朝覆滅前夕，在這座北方邊疆之上的都城，士人的城市體驗、文學實踐和歷史書寫之間呈現何種動態關係？當朝政日益混亂，軍事危機不斷加深，社會秩序持續衰退，士人又如何進行創造性寫作，在城市筆記中保留他們的都城文化記憶，從而構建王朝和帝都的歷史敘述？圍繞成書於1635年的《帝京景物略》（以下簡稱《景物略》），本文將辨析該作品所承襲的史地文本傳統，重構作者寫作動因及過程，並梳理其閱讀和流傳史，解析明朝末年文人眼中的都城歷史脈絡和文化形象。

城市筆記，以文人學者視角為框架，以名勝史跡、風土人情為主題，是古代城市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兼具史、地、文三重性質。³《帝京景物略》是明代以

¹ 有關北京城歷史的研究數量眾多，本文主要參考以下文獻：有關北京歷史地理的研究，參考侯仁之：《北京城市歷史地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有關明清時期北京城市空間變遷研究，參考 Jianfei Zhu, *Chinese Spatial Strategies: Imperial Beijing, 1420-1911* (New York: Routledge, 2003)。英文研究中有關北京史和史料，尤其是社會生活史方面的研究，最全面、最權威的著作是 Susan Naquin, *Peking: Temple and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0)。

² 王燦熾：《燕都古籍考》（北京：京華出版社，1985年），一書對先秦到清代的北京古籍文獻進行系統介紹。按留存題目數量計算，明代以前的文獻佔總量四分之一，其中大部分失傳。有關宋代文人的金中都出使日記介紹，參考 James Hargett, *Jade Mountains & Cinnabar Pools: The History of Travel Literature in Imperi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8), pp. 114-120. Ari Daniel Levine, “Welcome to the Occupation: Collective Memory, Displaced Nostalgia, and Dislocated Knowledge in Southern Song Ambassadors' Travel Records of Jin-Dynasty Kaifeng,” *T'oung Pao* 99, nos.4-5 (2013): 379-444.

³ 對中國古代城市筆記的研究，參考劉海霞：《中國古代城市筆記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

北京為主題的，內容最全、規模最大、成書最晚的作品。⁴全書按照城市空間方位分成八卷，其中包括原創散文 127 篇，收錄歷代詩歌千餘首，詳細記載了北京內外及畿輔附近數百處名所的歷史與現狀，綜合介紹了都城一帶的寺廟、道觀、市場、園林和山水。《景物略》不僅為當時讀者提供與都城有關的遊覽訊息，更為大量清代北京文獻的書寫和編纂奠定文本基礎。該書由數位學者合作完成。主筆劉侗（1593-1636），1634 年進士，湖北麻城人，晚明竟陵派詩文作家翹楚，負責散文部分的撰寫；于奕正（1597-1636），北京宛平人，負責全書內容校勘編訂。另有劉侗的同鄉好友周損（生卒不詳）參與書中詩歌的采編工作。⁵

目前學界對《景物略》的研究路徑主要有兩種。第一是文學史路徑。在明清文學史上，《景物略》被認作晚明「竟陵派後期小品文中的典型」。⁶劉侗的散文運用「深幽孤峭」、⁷高度詩化和陌生化的語言，在描寫荒涼孤寂之景時獨樹一幟；到 20 世紀 30 年代，被周作人（1885-1967）等現代學者樹立成傳統小品文學的經典作品。⁸當前的文學史研究主要關注作者生平交遊，闡述文本的藝術價值，並將此書納入明清時期以公安、竟陵二派作品為核心的「性靈文學」譜系。⁹第二是歷

⁴ 有關《帝京景物略》的介紹，參考王燦熾：《燕都古籍考》，頁 185-192。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194-207。

⁵ 有關《景物略》作者的考證研究，參考王燦熾：〈《帝京景物略》及其作者考〉，《北京社會科學》第 4 期（2006 年 8 月），頁 54-60。另，祝良文曾提出有另一位名為曹胤昌的人參與詩歌編輯，但據筆者研究，曹氏參與該書創作一事當存疑，因劉侗、於奕正及二人同時好友中無任何人提及曹氏，祝良文引用資料為孤例，故不採用。祝良文：〈《帝京景物略》作者補考〉，《武陵學刊》第 3 期（2013 年 5 月），頁 104-107。

⁶ 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頁 194。當下對竟陵派詩文的研究，最全面深入的是陳廣宏：《竟陵派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年）。有關歷代文人學者對竟陵派的評介，參考吳承學：《晚明文學思潮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⁷ 「深幽孤峭」為錢謙益對竟陵派鐘惺、譚元春文風的評價，後文詳述。〔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頁 517。

⁸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26。小品文體裁有複雜的構建和發展史，我們通常理解的、「幅短而神遙」的小品在晚明定型，被二十世紀初學者重新發掘和讚揚，之後確立其文學史地位。參考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 年）；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頁 17-41。相關英文研究參考 Charles Laughlin, *The Literature of Leisure and Chinese Modernity*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⁹ 吳承學：〈《帝京景物略》與竟陵文風〉，《學術研究》第 1 期（1996 年 1 月），頁 73-76。黃鳴：〈《帝京景物略》的世界——劉侗的情感空間〉，收入《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會議

史學研究路徑。在《四庫全書》中，《景物略》被列入「史部·地理類·古跡雜記」存目，¹⁰因此歷史研究者常把此書讀作一部明代北京城「旅遊導覽」，強調文本與明代社會生活之間的互證關係，從而還原 17 世紀北京城的風俗物產、¹¹園林建築等。¹²但與此同時，有不少學者對此書記錄、索引現實的功能提出質疑。在比對大量明清類書和商程指南後，清史學家韓書瑞 (Susan Naquin, 1944-) 曾評價《景物略》：「無地圖，無方向指引，無行程、停宿建議」，並沒有實用導覽功能。¹³與其他北京文獻，尤其是清朝編修的大型地志 (如《欽定日下舊聞考》) 互相校對後，學者發現《景物略》中存在不少事實性細節錯誤。¹⁴此外，劉侗幽默艱澀的語言風格以及書中對超自然現象和異聞傳說的記錄，都令學者在處理文本資訊時感到「難以完全窮盡其意」，無法完全依憑此書重建明末北京生活。¹⁵

筆者認為，綜合城市史料與散文文學雙重性質的《景物略》體現了文學創作與歷史書寫在明末都城特殊背景下的有機結合，其追述都城往事時的誇張或錯誤，不僅體現了作者的知識視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重構歷史時的價值

論文集》(武漢：武漢大學，2008年)，頁 114-124。劉洋：〈試論劉侗《帝京景物略》的寫景視角〉，《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頁 129-131。

¹⁰ [清]紀昀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 672-673。

¹¹ 對「歲時物產」的討論集中在〈春場〉、〈城隍廟市〉等記錄北京節令慶典、風俗物產的篇目。參考邱仲麟：〈繁華如夢：明代士人記憶中的三大市〉，見陳平原、王德威編：《北京：城市想像與文學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 19-34。張勃：〈《帝京景物略》中的歲時民俗記述研究〉，《民俗研究》第4期(2010年12月)，頁 77-92。李建英：〈《帝京景物略》中北京民俗敘述——以元宵節為例〉，《漢字文化》第5期(2017年3月)，頁 82-84。

¹² 對「園林建築」的討論多由建築史學者提出，參考賈珺：〈《帝京景物略》園林論述析讀〉，《建築史》第3期(2012年12月)，頁 99-113；劉永安、劉庭風：〈《帝京景物略》中官宦私家園林代表——清華園研究〉，《建築與文化》第3期(2016年3月)，頁 218-219。

¹³ Susan Naquin, *Peking: Temple and City Life: 1400-1900*, p. 255.

¹⁴ 對《帝京景物略》記錄準確性的質疑最早由清初學者高士奇(1645-1704)提出，見[清]高士奇：〈序〉，收入[清]朱彝尊(1629-1709)：《日下舊聞》第1冊(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藏42卷本)，頁 1a-1b。紀昀也舉出多條細節錯誤。現代學者在使用該書時，也認為書中部分歷史細節有爭議。後文詳述。

¹⁵ 例如，用書中文本討論北京名園佈局時，賈珺提出，雖然該書詞句優美，卻「難免存在以辭害意的情況，後人不易理解」，因此只能「從一定程度上發掘、解讀」其中蘊含的園林思想，「難以完全窮盡其意」。賈珺：〈《帝京景物略》園林論述析讀〉，頁 112。

判斷。基於前人研究，本文引入「文化記憶」這一批判視角，¹⁶把作者的思想、行動與文本連接起來，分析《景物略》與晚明其他體裁、類型的文本之間的「互文關係」，從而釐清明末文人對文史關係的思考並理解其史地書寫實踐的意義。在編寫過程中，劉侗等人搜集並參考了邸報、日記、遊記、金石文獻等資料，¹⁷通過轉述、改寫特定歷史事件，創造真假資訊參雜的敘述，將個人聲音置入文本，以此表達對明朝政治的反思，對社會時事的批判，甚至對未來的隱約擔憂。

下文將按時間順序分作三節。第一節關注《景物略》的成書過程。筆者將首先進入晚明作者視角，回顧《洛陽伽藍記》、《東京夢華錄》確立的「城市專書」史志傳統，整理明末作者可選的體裁資源。其次，解讀劉侗等人的都城調查和後續寫作過程，分析《景物略》蘊含的「當代史」寫作模式，並討論此特殊時空框架如何更新城市史志傳統。第二節將呈現集中體現「當代史」書寫策略的典型個案，通過詳細的互文分析展現作者在重述北京重大歷史事件時，如何既承接舊聞，又通過改動敘述細節，重構因果關係，從而傳達個人褒貶。作者通過梳理兩處皇家名所的歷史，回顧了持續困擾中晚明朝廷的兩大政治問題：北方遊牧政權的侵擾和內部宦官文臣之黨爭。本文最後一節探討都城文化記憶在明末和清代的流變。通過梳理《景物略》的出版史及各時代學人圍繞該書發起的關於明末歷史、晚明世風和竟陵文風的種種評議，探析明末都城文化記憶在後世的轉型。

二、「城市專書」構建明末文化記憶

士人用詩文表達故國哀思的文學傳統上溯至《詩經·黍離》，在中國古代各文學體裁中不斷發展。相較於山川河流，人類建設更加脆弱；離亂之際，集人力營造之大成的城市則成為集中呈現戰亂和災禍的場所。通過城市治亂講述歷史興衰是中國古代城市筆記的重要寫作目的之一。歷史的書寫，尤其是作者對親歷時代的書寫，與文化記憶密切相關。「記憶紮根於具體事物——空間、手勢、圖像

¹⁶ 對「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的經典研究來自揚·阿斯曼(Jan Assmann)。這一理論概念牽涉有關歷史和過去的知識，作者及讀者的身份認同和文化傳統的形成。Jan Assmann,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下文將詳述。

¹⁷ 據筆者考證，《景物略》援引的邸報有天啟六年《天變邸抄》，日記有《馬氏日鈔》等，遊記有李東陽、都穆、袁宏道、袁中道、王思任等人作品，金石文獻有歐陽修《集古錄》、潘迪《石鼓文音訓》、于奕正《天下金石志》等。

和物體」，其表達需要依憑文本寫作這一具體技術手段。¹⁸揚·阿斯曼(Jan Assmann, 1938-)曾提出，「文化記憶」關注存在於過去的「固定點」(fixed points)，但無法完全按照事物過去的樣子來保存它們，因此記憶常收束在「符號性人物」(symbolic figures)上。¹⁹筆者認為，在東亞文化的語境下，「物質遺存」、「符號性人物」和「歷史事件」均扮演了「固定點」的角色，在塑造文化記憶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用書寫來創造與城市有關的記憶，這一行為蘊含著書寫者所經歷的時空轉換：他以相對穩定的城市空間形態和可被感知的物質存在為媒介，用特定文本風格描述過去，建立一種今昔彼此呼應的共情，進而譜寫城市的「歷史」。引入時間與空間的複雜性，將深化我們對傳統城市筆記的認識：這一體裁不僅是屬於「史部地理類」的客觀記錄，還是傳遞作者生活經驗、情感狀態和歷史認知的創作。

鄭振鐸(1898-1958)曾評《景物略》：「一部奇書，敘景狀物，深刻而有趣。雖然不是像《洛陽伽藍記》似的那末一部關係國家興亡的史記，卻是很著力寫作的東西。」²⁰《景物略》對北地山水的詩意描寫使它從眾多北京城市筆記中脫穎而出，為它贏得「奇書」之名；但鄭氏對其無關「國家興亡」的結論仍需商榷。《景物略》完稿於明亡前十年，作者在資料整理和寫作過程中目睹朝廷江河日下，故此書並非與「興亡」毫無關係。實際上，細讀文本就能發現劉侗等人托憂思於藝文，把「史記」寓於「遊記」。

在《帝京景物略·略例》中，于奕正指出：「志山水古歟，得《水經注》焉。志梵剎古歟，得《雒陽伽藍記》焉。志熙遊古歟，得《武林舊事》焉。」²¹北朝楊銜之(生卒不詳)《洛陽伽藍記》(547)、南宋周密(1232-1298)《武林舊事》

¹⁸ Pierre Nora,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1989): 9.

¹⁹ 阿斯曼的理論討論源於對西亞、北非一帶上古文明的觀察，在傳統中國的情景下，需要進行調整。Jan Assmann,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p. 37.

²⁰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收入《鄭振鐸全集》第9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457。

²¹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7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201。《續修四庫全書》收錄《帝京景物略》崇禎八年金陵弘德堂初刻本，此版在篇幅和內容上與後世刪改修訂版有所不同，它能更直接地反映明末著者的創作意圖和書寫策略，故本文以此版為準。另，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初刻本為底本，由孫小力校註，出版簡體橫版排印本；2007年中國書店曾委託金壇古籍印刷廠復刻出版此初刻本。

(約 1280)，再加上北宋孟元老(生卒不詳)的《東京夢華錄》(約 1147)是構建故國文化記憶的典型城市筆記作品，筆者將此類作品稱為「城市專書」。這些作品不同於政府主導編寫的地方誌，均是文人自發自主創作，展示個人對外部世界的觀察。同時，有別於形式鬆散的日記體筆記或野史雜錄，這類專書有清晰的篇章結構和鮮明的主題，盡可能全面地記錄都城歷史文化資訊，通過追述過去的城市活動和特定事件，構建作者的前朝文化記憶。²²城市場所聯結歷史人物和事件，成為儲存記憶的位置。奚如穀(Stephen West, 1944-)等學者已經對宋代的追憶體城市專書進行了詳細研究，其特徵可被總結為以下三點：第一、文本的時間向度是回溯性的，作者通常身處新朝代的開端，而故國、故都已經成為與現在明顯割裂的過去。²³第二、作者使用看似中立、客觀、寫實的語言敘述過去，但文本並不是一個單純記錄過去的「透明」媒介；相反，作者用寫實手法構建了「另一種真實」(alternative reality)；文本世界裡的故都不受現實干擾，其形象永遠完美、神聖。²⁴第三、文本流露出的作者情感通常是懷舊感傷的，主要呈現在序跋中，但在追述歷史細節的正文裡卻鮮少表現。²⁵

經典的城市專書為《景物略》提供了體裁樣式和質量標準，但正如〈略例〉所說：「布體陳辭，更不躡向人一步」，劉侗和于奕正並未止步於簡單的模仿。²⁶明末北京的區位環境和城中的生活經驗讓劉侗採取了一種類似「當代史」書寫的策略，進而更新了城市專書的寫作傳統。與《洛陽伽藍記》等作品相比，《景物略》的獨特之處如下：第一、作者並非生活在朝代覆滅之後，而是身處國家力量

²² 中國歷代城市筆記形式靈活多樣，有些與地方誌類似，有些則更接近野史小說。筆者在此文定義的「城市專書」是指由文人作者獨立完成的，按照特定時空邏輯、或主題邏輯組織章節篇目，進而具備整體性結構的作品。

²³ 海外漢學研究者對追憶體書寫的研究較多，如 Stephen West,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Dream: the Sources, Evalu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Dongjing menghualu," *T'oung Pao* 71 (1985): 63-108. Ari Daniel Levine, "Walls and Gates, Windows and Mirrors: Urban Defenses, Cultural Memory, and Security Theatre in Song Kaifeng,"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39 (2014): 55-118. Stephen McDowall, "History, Temporality, and the Interdynastic Experience: Yu Binshuo's Survey of Nanjing (ca. 1672),"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8 (2018): 307-38.

²⁴ Levine, "Walls and Gates, Windows and Mirrors," pp. 97-100.

²⁵ 如〔北魏〕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4。

²⁶ 〔明〕于奕正：〈略例〉，收入〔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頁201。

和社會秩序的衰退過程中。這意味著，作者試圖保留的文化記憶包括當下正在發生或剛剛發生的事件，他對周邊的情感反應不僅直接迅速，還混雜了懷舊、焦慮、批判等多種維度。第二、與其提供一個完美輝煌的靜止城市景象，《景物略》文本展示了作者的實地觀察，詳細描繪了城中的荒廢、殘破的景象。²⁷第三、文本的文學性大幅提升。一方面，《景物略》的語言層次多元且雜糅：敘事時語言緊湊簡潔，描寫景色時高度詩意化、陌生化；另一方面，1635年《景物略》初刊本共收錄詩歌1347首，其中大部分為明人所著，從體例上擴充了散文體的抒情潛能。

有關劉侗生平，前人已有考述。需補充的是，劉侗與方以智（1611-1671）、凌義渠（1593-1644）等多位明清易代之際的著名學者文臣有交遊。²⁸劉侗少有文名，按《麻城縣誌》：「為諸生，即見賞於督學葛公。禮部以『文奇』參奏，同竟陵譚元春、黃岡何閔中降等，自是名亦著。」²⁹1629年，科場失意的劉侗與好友譚元春（1586-1637）一道從家鄉湖北來到北京，在譚氏介紹下結識于奕正。于奕正家境優渥，「工為詩歌，好遊名山」。³⁰三人志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正在此年冬天，皇太極率領滿洲軍隊一路南下突襲北京，在城南盧溝橋一帶與明軍交火，史稱「己巳之變」，持續數十年的明清戰爭自此進入白熱化階段。北京周邊大量村莊、寺廟被破壞，都城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³¹發生在天子腳下的動亂令劉侗、于奕正頗受觸動。1629年到1634年，二人深入北京城內及周邊進行遊覽調查，不僅尋訪耄老，還廣泛搜集碑刻舊典。《景物略》書稿約完成於1634-35年間。³²1634

²⁷ 此種「忠於現場」的寫作綱領，見同前註。《景物略》一書中關注廢墟景象的文章數量眾多，如〈玉泉山〉、〈功德寺〉、〈甕山〉等。

²⁸ [清]方以智：〈贈劉同人于司直〉，《方子流寓草》（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卷5，頁7。[明]凌義渠：〈和劉同人燕中即事詩〉，《凌忠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97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3，頁414-415。下文詳述劉侗與張自烈、王永積等人的交遊。

²⁹ [清]鄭慶華等修，[清]潘頤福等纂：《麻城縣誌》（光緒二年刻本），卷22上，頁5。

³⁰ 有關於奕正生平及劉、於二人交往始末，見[明]王崇簡：〈帝京景物略跋〉，《青箱堂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03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卷10，頁524。[清]周亮工：《書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148-149。

³¹ 參考孟森：《明清史講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322-327。有關明清戰爭的介紹，參考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³² 對本書成書過程考證最為詳實的是黃鳴：〈《帝京景物略》的世界——劉侗的情感空間〉，頁

年，劉侗考取進士；1635年授吳縣知縣。同年，二人一同啟程，在劉侗赴任途中遊覽南京，並著《南京景物略》手稿，惜不傳。³³1635年冬，《景物略》由金陵弘道堂刊行。初刻版收入劉侗師方逢年（1585-1646）序一篇，劉侗自序一篇，于奕正〈略例〉二十四則。1636年，于奕正急病客死江南。據周亮工（1612-1672）記載，顧與治（1599-1660）、楊無補（1598-1657）在金陵為于奕正發喪並歸葬宛平，還請劉侗、譚元春整理其手稿。但不到一年，于氏遺稿未成，劉、譚二人相繼因病辭世。³⁴

談及《景物略》的創作動因，作者並未直言明清戰爭，而是強調辨明北京歷史文化身分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作者從城市文獻史的角度論證北京文化身分的提升需要特定專著的支援。方逢年指出：歷代都城均有大量文學作品摹寫其歷史文化圖景，可北京的困境是「燕不可無書而難為書」。³⁵至於因何而「難為書」，方逢年解釋道：北京既無漢高祖原廟、漢武帝汾陰後土祠等歷史古跡，又無九成宮、華清宮等廣麗宮室；所以與長安、洛陽等著名古都相比，以北京為主題的文獻十分匱乏。于奕正回顧晚明北京文獻狀況時說道：

翼《順天府志》而傳者：《燕史》戚伯堅、《宛署雜記》沈榜、《長安客話》蔣仲舒、《長安可遊記》宋啟明等。或雜失倫，或訛，或漏，或漫，或俚。茲編，人徵其始末，事核其有無，博采約修，一新舊觀。³⁶

在《景物略》創作之際，已有的北京城市筆記或主題狹窄，僅關注城市的某些方

114-124。

³³ [明]于奕正：〈略例〉，收入[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頁201。

³⁴ [清]周亮工：《書影》，頁148-149。現存顧與治、金鉉（1610-1644）、施閏章（1619-1683）等人哀辭。[明]金鉉：〈古交行〉，《石臼集》（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前集卷3，頁11a-12b；〈同楊無補、顧同醫謀鑄於司直遺草，兼簡二子二首〉，《石臼集》，前集卷4，頁18；〈七夕到顧同醫寄詩及書兼報蘇武子於司直亡，傷惋賦此〉、〈秋夜讀于司直〈樸草〉〉，《石臼集》，前集卷5，頁55；〈哀于司直〉，《石臼集》，前集卷2，頁52。[清]施閏章：〈書於司直哀鈔之後〉，《學餘堂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313冊，卷26，頁318。

³⁵ [明]方逢年：〈序〉，收入[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頁193。

³⁶ [明]于奕正：〈略例〉，收入[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頁199-200。

面，或文字內容粗濫，或早已失傳。表章歷史人物，核查歷史事件，改變現有的文獻狀況，成為寫作的第一要務。³⁷

北京文獻的不足與其地緣政治狀況密切相關。作為燕王朱棣（1360-1424）封地的北平城在靖難之役（1399-1402）後成為明朝北都。明北京始終身處國家邊疆：14-16世紀直面來自蒙古的威脅；1610年代後，滿洲勢力的崛起和擴張使北京進一步暴露在外患之中。實際上，中原政權與北方遊牧政權之間的角逐已在北京一帶持續數百年。《景物略·略例》指出，作為遼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歷史上的北京「華夷」混雜，因此作者有義務整理舊聞，從而「退夷進夏」：

地從石晉割後，不隸中土六百餘年，而遼、金、元遞都之，故奇跡異聞，事多三史。編中為表舊事，不盡刪削，退夷進夏，深用撫然。³⁸

這一看似保守「漢族中心主義」的論調在明末的時代背景下又有明確的現實意涵。伴隨國家北邊危機日益加重，北京城是否還適合承擔國家都城的功能？朝廷是否有必要把政治中樞回遷南京？這些問題曾在士人當中引發討論。³⁹在自序中，劉侗花大量篇幅，從歷史地理和五行風水的角度闡釋了北京作為都城的正當性。這一辨析在晚明城市筆記中非常少見，亦多被以往《景物略》研究者忽視，故在此展開說明。⁴⁰劉侗云：

帝北宅南向，威儀福夏。玉食航焉。蓋用西北之勁，制東南之饒；亦用東南之饒，制西北之勁。饒勁各馭，勢長在我。若欲饒其所勁，勁其所饒，則不識先皇之遠算矣。⁴¹

³⁷ 同前註，頁 201。

³⁸ 同前註，頁 200。

³⁹ 遷都問題在 1640 年代變成朝廷核心議題之一。參考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洪業：清朝開國史》，頁 213-237。

⁴⁰ 據筆者所見，僅學者黃鳴在其論文中簡要涉及劉侗等作者的「華夷觀念」，並提到其面臨現實困境，會「隱約地想到亡國之痛」，但未見黃氏對此進行深入剖析。黃鳴：《〈帝京景物略〉的世界——劉侗的情感空間》，頁 119。

⁴¹ 〔明〕劉侗：〈序〉，收入〔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頁 198。

首先，不同的地理區域有各自優勢，北京雖處邊地，但恰可以聯通驍勇善戰的西北和富庶繁榮的東南，在區域平衡中增長國家之「勢」。其次，與洛陽和關中相比，北京的關隘位置十分特殊，只要加強此地防守，便能守衛中原腹地。劉侗繼續論道：

燕雲割而中華蹙，嶺可界也，界之；河可界也，界之；江可界也，界之。……
中宅天下，不若虎視天下，虎視天下，不若掣天下為瓶，而身抵其口。雒
不如關，關不如薊。守雒以天下，守關以關，守天下以薊。⁴²

處於中原邊界的北京戰事頻發，若燕雲一帶交割給外族，「中華」只能每況愈下。另外，與江南溫潤優美的環境不同，北京粗礪嚴酷，「目指所及，風高沙飛，土剛水鹼」；在這樣的生態環境下，「三百年來，率土臣民，罔不輻合，紅塵百日，無有閒人」，定能培養強兵勁旅。劉侗極力證明，文皇帝朱棣「得天子自守邊之略」，先人偉業在北京一帶得以成就，正是「江北主，江南賓」的體現。因此，定都燕地是「天人合發」，而《景物略》所做是向讀者詳細闡明這個道理。⁴³

在明末邊境都城這一特殊時空框架下，劉侗等人的書寫策略也與傳統城市專書有所不同。對歷史人物、事件和地點的記錄不再是簡單地平鋪直敘。方逢年提示讀者：古人之志，如《陳留風俗志》、《襄陽耆舊志》、《嶽陽風土志》等，「志焉爾」，劉侗之「志燕異是」，「其言文，其旨隱，其取類廣以僻，其篇幅無苟畔」。⁴⁴于奕正進一步詳述如何達成「言文旨隱」的表達效果。首先，作者把個人褒貶隱藏在《景物略》的文本中，以達到「旨隱」：

山川記止夷陵，剝字記止衰盛，令節記止嬉遊，園林記止木石，比事屬辭，
不置一褒，不置一譏。習其讀者，不必其知之，言外得之。⁴⁵

其次，作者對記敘手法進行嚴格控制，反覆斟酌取捨內容，精心排布情節，以達到「言文」：

⁴² 同前註。此處「雒」指洛陽，「關」指關中。

⁴³ 同前註。

⁴⁴ [明]方逢年：〈序〉，收入[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頁195。

⁴⁵ [明]于奕正：〈略例〉，收入[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頁201。

是編著作，在記敘間，篇有幅，幅有其首尾，或體致弗合，亦捨棄舊聞。⁴⁶

在城市筆記這一傳統上承載野史雜談的「邊緣」體裁中，劉侗和于奕正實踐了「微言大義」的史學寫作方法，即通過街談巷語等「微言」，傳遞有關王朝歷史的「大義」。⁴⁷誕生於繁榮的晚明出版業中的《景物略》援引了大量元明筆記小說，其創作過程伴隨著作者對參考文獻的取舍、合併、改編和重寫。作者有意調度各類資訊，進而重整歷史敘述過程，也為我們開闢探尋作者生活經驗和情感世界的路徑。筆者認為，若要全面理解《景物略》一書在歷史書寫實踐上的創新和意義，我們需重建晚明語境，批判性地解讀文本，並挖掘作者隱含其中的觀點。下節的個案分析將深入文本內部，解讀作者構建文化記憶的過程，並重新審視城市筆記文本的多重涵義。

三、「奇跡異聞」敘述與都城歷史建構

北京城裡生活著各種各樣與王朝命運息息相關的歷史主體——皇帝、宦官、將領、士子，等等；他們在特定歷史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產生了特定的物質遺存，並在後世敘述中成為「符號性人物」。《景物略》中有多篇文章以明皇室及其近臣為主角，其經歷遭遇多牽涉朝廷政事，集中反映了劉侗等人對都城乃至國家政治命運的追述，構成了北京在文化記憶方面有別於其他城市的最獨特的內容。作者在處理此類議題時，一方面，裁剪情節，重構因果邏輯，從而評定歷史功過得失；另一方面，細膩勾勒事件發生的環境背景，引導讀者情感，促使讀者對歷史事件中的人物進行共情想像。⁴⁸在本文有限的篇幅內，與其對這些文章進行泛泛概述，不如深入特定個案，挖掘文本構建過程。故本節將選取兩篇在敘述策略上最具代表性、同時也是持續吸引明清讀者興趣的文章——〈皇姑寺〉和〈南海子〉，分析此文本與晚明其他文獻及與書內收錄詩歌之間的「互文關係」。本

⁴⁶ 同前註，頁 200。

⁴⁷ 「春秋筆法」和「微言大義」之說，來自〔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臺北：鼎文書局，1986年），頁 1701。

⁴⁸ 筆者曾在其他論文中指出，《景物略》在追述明末黨爭事件時通過改變敘述中的細節描寫而改動對事件發生的邏輯因果，從而隱晦表達作者對當朝政治的批判。參考 Naixi Feng, “Mushroom Cloud in the Northern Capital: Writing the Tianqi Explos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ate Imperial China* 41.1 (June 2020): 71-112.

節將展示劉侗處理歷史事件的兩種基本策略：改寫真實歷史事件的資訊和編織真假資訊參雜的「擬歷史事件」，從而揭示北京城「中心」與「邊緣」交錯的文化身分，以及作者對明朝外交內政的複雜認知。

（一）〈皇姑寺〉與明英宗北征蒙古

皇姑寺，又稱保明寺，是明清時期北京著名寺院，位於京城西郊的黃村。按劉侗〈皇姑寺〉一文，明英宗天順年間（1457-1464），該寺為紀念一名女尼呂氏而建。〈皇姑寺〉位於《景物略》第五卷「西城外」，回顧英宗北征蒙古的歷史事件。全文如下：

皇姑寺，英宗睿皇帝復辟建也。正統八年駕出紫荆關，親征也先，陝西呂尼迎駕諫行，曰「不利」。⁴⁹上怒，叱武士交捶，尼跌坐以逝。及蒙塵虜營，數數見尼，娓娓有所說，時時授上餅餌。駕返，居南宮，數數見尼，娓娓有所說。復辟後，詔封「皇姑」，建寺，賜額曰「順天保明寺」。或曰：「隱也，如云『明保天順』焉。」後殿祀姑肉身，跌坐愁容，一媪也。萬曆初年，像未飾以金，頂猶熱爾。姑著繡帽，製自宮中。殿懸天順手敕三道，廊繪己巳北征之圖。⁵⁰今寺尼皆發，裹巾，繕方袍，男子揖。⁵¹

此文有以下幾個幾點需要注意。第一、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按照劉侗敘述，英宗朱祁鎮（1427-1464）領兵北征蒙古的瓦剌部落，一名呂姓的尼姑前去勸諫，試圖阻止皇帝北行。英宗沒有聽從建議，還下令處死呂尼；後來北征失敗，被瓦剌人俘獲；再被遣返北京。新任的景泰帝朱祁鈺（1449-1457 在位）將其幽禁八年。英宗復辟後，對呂尼感到愧疚，故興建保明寺以示紀念。第二、呂尼的鬼魂在英宗被囚禁時反覆出現並與之互動。第三、自英宗朝以後，皇姑寺始終與皇家關係密切，頻繁接受貴戚供養，至劉侗的時代依舊香火旺盛。

⁴⁹ 明英宗初次即位使用年號正統（1436-1449），復位後使用年號天順（1457-1464）。英宗正統八年即 1443 年；英宗北征蒙古是 1449 年。此處記載時間錯誤。紫荆關位於河北省易縣。也先是蒙古瓦剌部族的實際掌權者。

⁵⁰ 己巳北征即 1449 年（己巳年）英宗北征，又稱「土木堡之變」。

⁵¹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頁 399。

對照《明實錄》、寺廟碑文等史料，劉侗〈皇姑寺〉一文有三處錯誤或存疑之處。第一、英宗北征瓦剌發生在 1449 年（正統十四年），而非 1443 年（正統八年）。其北征路線取道龍虎台、居庸關，經宣府到達大同，並沒有經過文中提到的紫荊關。⁵²第二、皇姑寺的建造歷史並非英宗復辟後敕建。雖然《日下舊聞》、《天府廣記》等清代文獻沿用劉侗的敘述，但根據 1525 年（嘉靖四年）〈敕賜順天保明碑記〉，皇姑寺是正統年間（1436-1449），即英宗出征之前，由來自陝西的呂尼親自建造的。據碑記，呂尼曾「置買田地六頃十五畝，起蓋寺宇一所，朝夕焚修。」第三、呂尼去世的時間存在爭議。按碑記：「呂大闡主，夙功行樹立□□，弘治二年四月初一時，忽無疾而卒。」⁵³也就是說，呂尼辭世並非在 1443 年，而是遠在英宗去世後數十載的 1498 年（弘治二年），並且是無疾而卒，並非《景物略》文中所述的暴力死亡。

明代有許多歷史筆記均記載皇姑寺掌故，為劉侗的寫作提供了基本的資訊資源。據筆者所見，「呂尼死諫」的故事最早見於 1583 年出版的筆記集《耳談類增》卷 16〈史脛篇〉，題為〈皇姑呂尼〉。⁵⁴《耳談類增》為《景物略》故事提供了基本敘事要素，包括「英宗出征」、「呂尼枉死」等情節，呂尼鬼魂與英宗的互動，以及寺廟在後世享受的特權。約二十年後，《萬曆野獲編》（1603）參照《明世宗實錄》、《明世宗寶訓》等資料，記錄了嘉靖（1522-1566）初年在皇姑寺存廢問題上出現的政治鬥爭。⁵⁵其中，嘉靖帝不滿於「順天保明」之隱喻，亦不滿於「皇姑」二字，認為其有礙皇室名聲，故極力主張廢寺。⁵⁶但嘉靖的伯母張太后與

⁵² 景愛：〈京西皇姑寺明代石刻叢考〉，《出土文獻研究》2005 年第 7 期，頁 383。

⁵³ 碑記收入景愛：〈京西皇姑寺明代石刻叢考〉一文。同前註，頁 381-391。

⁵⁴ 全文如下：「北城外，宛平西黃村，有敕建保明寺。姑尼呂氏，陝西人，寓此地。正統間，駕出禦虜，尼逆駕，苦諫不可去。不聽。及蒙塵虜營，上常恍惚見尼陰相呵護，皆有詞說。後還轅復辟，念之。封為禦妹，建寺賜額，故又稱『皇姑寺』云。自是凡貴家女，纓髻皆居其中。有寺人、司戶人不易入。」〔明〕王同軌：《耳談類增》（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唐氏世德堂刻本），卷 16，頁 1。

⁵⁵ 有關嘉靖年間圍繞皇姑寺存廢的政治鬥爭，參考陳玉女：〈明嘉靖初期議禮派權與佛教肅清：以皇姑寺事件為考察中心〉，《明代的佛教與社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何孝榮：〈論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成大歷史學報》第 30 號（2006 年 6 月），頁 139-177。對晚明北京佛教活動的介紹，參考何孝榮：《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 年）。

⁵⁶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685。

生母蔣太后爭權，雙雙向皇帝提出保留此寺的主張，並爭奪此寺的專有供養權。⁵⁷張氏、蔣氏和嘉靖帝代表的三股不同政治勢力圍繞皇姑寺的存廢展開角逐，皇室內部衝突演化成朝廷黨派鬥爭，而在多方斡旋中，這座尼寺最終免於拆毀。據學者研究，「呂尼死諫」和「順天保明」這兩段異聞很可能是 15 世紀晚期寺廟為提升威望而編造的說法。事實上，自 16 世紀始，皇姑寺人口日益增多，權勢日益熾盛。⁵⁸

約 1599 年，王思任（1575-1646）與友人同遊西山，在〈遊西山諸名勝記〉中，他用辛辣的筆調記下自己拜訪皇姑寺時的景象：

今其徒繁衍數百，玄發皆以色市。長安貴人往往以為異味染指。染指者所事齟齬，須出其胯下則亡咎。⁵⁹

此時寺內女尼人數眾多，蓄髮，穿僧袍，出賣色相，帶有「異味」風情。她們「價甚翔，倍於名伎，老尼更滑於鴿。奉詔宦者門之，僧不許入。」⁶⁰寺中生活的腐朽令王思任深感震驚。他評價，在掌事「賊禿」老尼的管理下，年輕的尼姑服侍權貴，有「侍兒」之實，已同京中妓女無異。⁶¹恰恰是在宮廷勢力的庇佑下，皇姑寺成為京城一處高等煙花場所，處於任何監管機構的管轄之外。

劉侗作品的成文時代最晚（與沈、王作品相距三十餘年）但篇幅最長，不僅記錄一系列與英宗北征有關的事件，還在敘述中通過對死亡和身體的描寫，傳遞作者對歷史事件的反思和對相關人物的同情。對比早期資料，《景物略》故事的第一個特點是人物形象的複雜化。英宗不再是威嚴神聖的天子，而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施害人和受害者。暴力和無助扭結在英宗的人物形象上：他因剛愎自用而慘敗，在多年的牢獄之災中經歷孤獨和恥辱。與之相對，呂尼的形象有出家人的慈悲從容：在暴力交誼中，她保持「趺坐」的平靜姿態；冤死後依舊探望身陷囹圄的皇帝，與他交談並奉上食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對英宗和呂尼的互動的反

⁵⁷ 同前註。

⁵⁸ 同前註，頁 865。

⁵⁹ [明]王思任：〈遊西山諸名勝記〉，《文飯小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6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卷 3，頁 6a。

⁶⁰ 同前註，頁 6。

⁶¹ 同前註，頁 6b。

覆描寫，這點與早期的簡略敘述顯著不同。早期文獻大多簡單勾勒「上常恍惚見尼陰相呵護，皆有詞說」，但在《景物略》中，「（英宗）數數見尼，（尼）娓娓有所說」一句反復出現。⁶²在敘事結構上，呂尼的低語串聯起英宗人生不同階段的遭遇。同時疊詞的巧妙使用，以「數數」二字強調英宗被囚時的困窘，以「娓娓」二字描摹呂尼低語時的神態，凸顯了她的寬容，繼而傳遞了對皇帝落難的悲憫之情。

《景物略》中呂尼形象的慈悲化和忠義化傾向同樣可被文後附詩應證。〈皇姑寺〉一文後收錄三首詩歌，每一首都著重描寫寺院的肅穆氛圍和呂尼為大義而犧牲的悲壯精神。王應遴（?-1645）詩云：「老尼肅客衣冠闊，往事懷忠夢寐回。」梁稷（生卒不詳）詩讚頌了寺院的莊嚴：「劫火未灰香篆結，風幡不動法燈燃。」而王驥德（1560-1623）則在詩中追述呂尼如何死諫報國：「先皇曾北伐，切語扣前旌。定入龍飛後，神隨禦輦行。法原無怖畏，國自報功名。弘見兒孫福，燒香過此生。」⁶³

第二、《景物略》的故事試圖構建國家災難與個人苦難之間的聯繫，並把作者的觀察視角置入敘述。首先，劉侗把「順天保明寺」的隱喻寫進《景物略》，把這座尼寺的修建看做國家災難的證據，並以呂尼的枉死作為這場軍事失敗的預兆。同時，呂尼的肉身像被賦予複雜的情感意涵。在中國佛教傳統中，肉身像被看成見證高僧修為的聖物，它以人身為基礎，不僅保留逝者身體，還記錄了死亡時刻的神態容貌。劉侗曾在皇姑寺親自觀察「趺坐愁容」的呂尼像並提到「萬曆初年，像未飾金，頂猶熱爾。」呂尼的體溫曾在死後持續存在，萬曆初年的人尚能感受天順時肉身的溫度。而「猶」字表明，到劉侗的崇禎年代，肉身像伴隨著金裝，其溫度已經消失，它從「人」的身體遺存轉化成了無生氣的「物」。這具塑像徹底變成一種物質的遺存，成為現在與過去的記憶聯結，被遊人觀瞻禮拜。

另外，《景物略》以留白的方式迴避了早期筆記中常見的對皇姑寺的批評。在回顧英宗和呂尼的生平後，敘述視角移動，帶領讀者進入寺廟正殿，那裡掛「天順手敕三道」，殿外廊下「繪己巳北征之圖」。與稍早的王思任遊記不同，此文

⁶² 另一部記載呂尼事蹟的筆記是蔣一葵《長安客話》，劉侗也曾把此書用作參考，見〔明〕于奕正：〈略例〉，收入〔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頁5。這句簡略描述同時出現在《耳談類增》和《長安客話》中。〔明〕蔣一葵：《長安客話》（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60。

⁶³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頁399-400。

完全沒有描寫皇姑寺內尼眾的淫侈生活，只是點出這些女子不尋常的裝束舉止。文章結尾處，讀者被重重問題所困擾：見證英宗軍事失敗的檔案為何會公然展示在寺裡？這裡的出家人又為何蓄髮裹巾，在問安時像男子一樣作揖？劉侗沒有提供任何解釋。

正如《帝京景物略·略例》所提，「習其讀者，不必其知之，言外得之」。在〈皇姑寺〉一文中，女性、帝王、民間文化、外交事務等截然不同的話題聚集在一處皇家供養的寺廟中。基於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和事件，劉侗在情節安排、細節添減等方面調整敘事，弱化皇家寺院中的現實問題，凸顯歷史事件無奈悲壯的一面，以及其中英宗、呂尼個人悲劇與國家災難之間的呼應。在此，作為佛寺和塑像的「物質遺存」、以皇帝和尼姑為代表的「符號性人物」和土木堡事變這一「歷史事件」，三者聯合作用，把北京所經歷的戰爭和危難「固定」成歷史，構成了專屬於北方都城的文化記憶。

（二）〈南海子〉與明末宦官政治危機

與〈皇姑寺〉「以訛傳訛」改動歷史資訊不同，〈南海子〉一文體現了「以假亂真」的書寫策略。作者通過編織真假參雜的資訊，製造「擬歷史事件」，並藉此影射宦官政治，勾勒北京城荒涼詭異的邊境氣象。南海子位於北京城南，地勢低窪，多沼澤，曾是遼金古戰場。元代為蒙古皇室「捺鉢」狩獵之用。明代加修圍牆，增添建築，而南海子的功能亦越發多元。皇帝曾在此舉辦狩獵和其他武功儀典；隆慶（1567-1572）後，講武儀式漸漸廢弛。⁶⁴南海子作為皇家直接管轄的苑囿負責向宮廷提供蟾酥等藥物。此地由宦官組成的「淨軍」守衛，一般民眾不可進入。另外，南海子還是有罪內監的服役場所。⁶⁵明中後期，伴隨宦官政治勢力的擴張，成年男子自主淨身充當宮役的現象屢禁不止，自宮者通過賄賂手段，

⁶⁴ 趙一澧：〈明代北京南苑考〉，《呼倫貝爾學院學報》第3期（2005年6月），頁5-8。

⁶⁵ 1626年，此地曾發生一起駭人慘案：司禮監掌印太監王安在與魏忠賢（1568-1627）的權力爭奪中失敗，被發配到南海子後，被處私刑慘死。《明熹宗實錄》「天啟元年七月六日」條，記載王安發配南海子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熹宗實錄》第125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年），頁592。「天啟四年六月一日」條，楊漣彈劾魏忠賢疏記載：「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王安）於南海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熹宗實錄》第129冊，頁2384。

設法在南海子充當雜役，等待入宮機會。⁶⁶

〈南海子〉一文收入《景物略》第三卷「城南內外」。這篇文章的寫作手法與地志類似，開篇介紹此地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沿革。但在文章後半段，敘述視角發生變化，展現發生在此地的一系列奇景異聞。首先是每年清明節前後，千百螞蟻聚集，形成「螞蟻墳」的景觀：

海子西北隅，歲清明日，蟻億萬集，疊而成丘，中一丘，高丈，旁三四丘，高各數尺，竟日而散去。今土人每清明節往群觀之，曰「螞蟻墳」。傳是遼將伐金，全軍沒此，骨不歸矣，魂無主者，故化為蟲沙，⁶⁷感於節序，其有焉。⁶⁸

緊隨這一奇觀的是一個「志怪」故事——一位名叫來定的宦官來南海子取蟾酥，偶然與一個骷髏對話，後來死於非命：

歲五日，中侍例同太醫院官來捕蛤蟆。嘉靖中，御用監奉禦來定，五日方捕，至羊房南大柳下，坐柳根午食。顧旁一骷髏，來濡肉蒜盤，內骷髏口，戲問：「辣否？」骷髏曰：「辣。」來驚，去肉，辣音不已。驟馳而歸，辣辣音追之，數日來卒。⁶⁹

這段故事參考馬愈（1435-？，1464年進士）的《馬氏日鈔》（以下簡稱《日鈔》）和馮夢龍（1574-1646）《古今譚概》（1620，又稱《笑史》，以下簡稱《譚概》）。劉侗摘取其中相關情節，並加以改編。《日鈔》記錄了大量京師趣聞，其中〈骷髏怪〉一篇記載了一位名叫來定的太監在南海子的離奇遭遇。《日鈔》中，御用監來定在五月前往南海子履行公務，但未說明是何差事。來定「從五六騎出城，舁肴酒為

⁶⁶ 記載南海子淨軍和自宮者的史料可參考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中〈禁自宮〉、〈內臣罪譴〉兩篇。按《明實錄》，天順、正德（1505-1521）年間有多條詔令、上疏，議論自闖者混入南海子事。

⁶⁷ 「蟲沙」一詞源自《抱樸子》：「三軍之眾，一朝盡化。君子為鶴，小人成沙。」〔晉〕葛洪：《抱樸子》（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54。

⁶⁸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頁326-327。

⁶⁹ 同前註，頁327。

路食」，正午到羊房南大柳樹下午餐，發現一骷髏在旁，於是夾肉濡蒜「戲納骷髏口中」，並問「辣否」。骷髏突然應答：「辣！」來定驚悸，倉皇奔逃，但骷髏呼聲一直縈繞耳旁，隨其往返。數日後，來定得疾，數日而歿。⁷⁰在這篇文章的結尾，馬愈討論了陰陽之氣與人心術邪正之間的關係：

蓋來之將亡，陽氣虧矣，故陰氣得以幹之。況冥穢之物，不宜相戲，戲則我心有不得其正矣。心不正，邪必乘之。觀此則可以為戒矣。⁷¹

馮夢龍《譚概·骷髏言》與馬愈《日鈔》內容相同，但刪除結尾處評論。馮夢龍還提到，〈骷髏言〉故事原型出現時間很早：「元代《江湖紀聞》載習家湖骷髏呼鹽事如此。」⁷²《江湖紀聞》原文已佚，但習家湖骷髏故事收入明代商浚（生卒不詳）編大型叢書《稗海全書》之《異聞總錄》。全文如下：

至元丙子，廬陵印岡羅某，數人夜行，至地名習家湖。因食鹽梅，以核置道旁骷髏之口，問曰：「鹹不鹹？」前行至長坑，月光燦然，見后有黑團旋轉隨逐而來，呼曰：「鹹，鹹！」諸人大懼，疾行十餘里，至榮村渡水，方不聞聲。⁷³

在旅途中偶遇骷髏是《莊子》卷 18「至樂」中的經典情節。莊子與骷髏展開了一段關於生死的機辯，並以此反觀富貴之無常。在莊子寓言中，生與死的邊界變得模糊；而骷髏這一死物張口發聲，提示了生死置換的可能。⁷⁴在旅途中，行旅者暫時從日常社會關係中脫離，遠離家鄉和人群，身處陌生危險的野外環境。而骷髏既是人，又非人，它經歷過並代表著死亡。⁷⁵在這樣的背景下，人與骷髏的互動顯

⁷⁰ [明]馬愈：《馬氏日鈔及三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頁8。

⁷¹ 同前註。

⁷² [明]馮夢龍：《笑史》（即《古今譚概》）（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9年），頁498。

⁷³ [明]商浚編：《異聞總錄》，收入《稗海全書》（廣東：中山圖書館藏清康熙振鷺堂據明商氏刻《稗海》本重編補刻本），卷1，頁19a。

⁷⁴ [戰國]莊子著，[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617-619。

⁷⁵ Stephen Owen, *Remembrance: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4.

得十分恐怖。元明故事裡的骷髏不再進行莊子式的哲學討論，而成為討命的陰魂。但元代故事中的廬陵羅某最終生還，明代故事中的宦官來定卻難逃一死。馬愈的「陰陽之論」為來定之死提供了一套以道德為基準的理論闡釋：宦官陽氣虧損，又與冥穢之物相戲，心「不正」，故「邪」趁機而入。

對比《日鈔》故事，《景物略》的改動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刪除馬愈評論，僅保留主要情節。這一改動不僅使文章行文緊湊，更重要的是隱去作者的評論性聲音，使敘事盡可能「去主觀化」，從而營造「客觀」的歷史敘述樣貌。第二、來定生卒年本不可考，劉侗把約 15 世紀後半葉的《日鈔》故事改到嘉靖年間（16 世紀中葉），前後相差近百年。第三、劉侗給來定安排了具體的「公幹」——取蟾酥。這一細節的添加不僅讓來定的行為看上去更加「真實」，還為故事更添一層諷刺意味。值得注意的是，《譚概》和《景物略》的其他章節都有關於「取蟾酥」的記錄。此事曾是明代太醫、宦官在北京城誇顯權勢的重要場合。按馮夢龍，晚明太醫院有採蟾酥差事，某院判故意在當差途中在城裡繞道從而向朋友炫耀。其友作詩嘲諷：

白馬紅纓出禁城，喧天金鼓擁霓旌。穿林過莽多豪氣，拿住蛤蟆壞眼睛。⁷⁶

《景物略》卷 2〈春場〉記載北京各月節令風俗時有云：

五月，……太醫院官，旗物鼓吹，赴南海子，捉蛤蟆，取蟾酥也。其法：針棗葉，刺蟾之眉間，漿射葉上，以蔽人目，不令傷也。⁷⁷

蟾酥取自蛤蟆眼睛，有劇毒，需用針刺取出，採取過程十分危險。據《明實錄》記載，有多名內監在取酥過程中中毒身亡。⁷⁸〈南海子〉一文中，宦官來定在一個

⁷⁶ [明]馮夢龍：〈采蟾酥差〉，《笑史》，頁 375。蔣一葵《長安客話》記載當時北京流行的竹枝詞，與此詩相近：「抖擻威風出鳳城，喧喧鼓吹擁霓旌。穿林批莽如虓虎，捉得蛤蟆剜眼睛。」[明]蔣一葵：《長安客話》，頁 31。

⁷⁷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頁 265。

⁷⁸ 《明神宗實錄》「萬曆三十三年（1605）十二月二十七日」條：「禮部言：每歲端陽，太醫院官同聖濟殿內官往南海子採取蟾酥，殘傷物命甚多。」但未見皇帝批覆，故取蟾酥一事未被廢止。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神宗實錄》第 114 冊，頁 7864-7865。

「旗物鼓吹」、炫耀權勢的場合中意外身亡，頗具諷刺意味。劉侗通過細化人物設定和剪輯編織情節，將個人價值判斷融入對南海子這個地方的歷史書寫：心術不正之人攝取毒物，又與冥穢之物相戲，即使再有權勢，也難逃生死裁定。

縱觀《景物略》，劉侗對宦官的批判連貫、系統，且十分隱晦。筆者認為，這與劉侗寫作時複雜嚴苛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雖然崇禎皇帝（1627-1644 在位）在即位初曾大力清算朝廷宦官勢力，但執政不久又重新倚重內監，各黨派之間矛盾衝突加劇。⁷⁹劉侗好友譚元春為復社成員；竟陵派文人多廣泛參與政治運動。⁸⁰劉侗等人同情並支援東林、復社文人的立場在《景物略》中有明確表現。在此語境下，于奕正所稱的「不置一褒，不置一譏」又有保全作者免受政治牽連之意。綜合《景物略》各篇來看，凡有描寫宦官或涉及宦官政治的情節，均伴有暴力、死亡、廢墟等意象。例如，〈首善書院〉一文記載東林學者鄒元標（1551-1624）、馮從吾（1556-1627）在北京創辦學院，宣講理學和士人政治理念的事蹟。全文主要内容是複述鄒、馮二人語錄，但在篇末，劉侗的敘述突然轉向書院在魏忠賢（1568-1627）掌權時期的遭遇：「崔（呈秀）、魏（忠賢）盛，黨禍深」，書院慘遭拆除，「乃碎碑，暴其碎於門外，乃毀先聖主，焚棄經史典律於堂中。院且拆矣。」⁸¹又如〈摩訶庵〉一文，上半段追憶萬曆年間京城士大夫在此觀花作詩之樂事，結尾處突然轉向此地發生的暴力事件：魏忠賢在偶然經過此地時，見士人聚集，於是命令拆毀寺院建築；自此「人相戒不過」，該寺漸漸衰落。⁸²

從 1620 年左右開始，南海子及其周邊的管理日漸廢弛：園內宮苑荒蕪，在此服役的宦官彼此爭鬥，更有盜賊、逃兵置身其中。據《明實錄》記載，天啟二年（1621），南海子內頻繁出現劫盜事件，次年捕獲盜賊，細審之後發現「半是逃兵，半是通州營丁」。⁸³時任太常少卿的董應舉（1557-1639，1598 年進士）曾上

⁷⁹ 孟森：《明清史講義》，頁 319-322。

⁸⁰ 有關譚元春等竟陵派文人的政治傾向，參考張永剛：《東林黨議與晚明文學活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65-189；鄔國平：《竟陵派與明代文學批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頁 15-25。

⁸¹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頁 341。崔呈秀（1571-1627），1613 年進士，政治上擁護宦官魏忠賢，被視為「閹黨」成員。1627 年，崇禎皇帝即位後，魏忠賢落敗自殺身亡，崔呈秀也隨之自殺。

⁸² 同前註，頁 395。

⁸³ 《明熹宗實錄》「天啟三年十月五日」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熹宗實

疏稱南海子是「巨盜高景仕之窟穴」。⁸⁴在〈南海子〉一文後，劉侗又附上戴九玄（?-1622）詩：

城南海子四十里，大狩禽物此中是。
樹木環植周以垣，日獲雉兔奉至尊。
內官監守但坐看，四垣崩圯禽物散。
樹木斫買雉兔空，白日劫盜藏其中。⁸⁵

在戴九玄看來，南海子已成為朝廷藏汙納垢之地。原本守衛御苑的內監怠忽職守，坐看財物流失；他們甚至勾結賊人，監守自盜，變賣公產以謀私利。南海子的衰落與內監的腐敗密不可分，但同時也深受國家外患的影響。敘述完來定的故事，〈南海子〉以一段肅穆冷峻的邊境之景結尾：

海子西牆，有沙崗委蛇，歲歲增長。今高三四丈，長數十里矣。遠色如銀，近紋若波，土人曰「沙龍」。⁸⁶

沙塵天氣頻繁光顧氣候乾燥的北京。南海子西牆外沙丘緩慢增長，與遠處巍峨的城牆、宮殿形成巨大反差。銀龍一般的沙丘提示遊人和讀者，這座城市位於國家邊境，文學傳統中「邊塞詩」的意象在此成為真實的環境。1629年冬，滿洲軍隊進攻北京，曾駐兵南海子，這座皇家苑囿一度落入外敵之手。⁸⁷而劉侗恰好是這一年入京趕考，沿途目睹了皇城及周邊地區的禍亂。在此背景下，〈南海子〉前半段描寫的螞蟻墳似乎不再是單純的城市奇觀。作為遼金古戰場的舊址和明清戰爭的「新址」，無數將士曾在此死亡，化作「蟲沙」。生與死在邊境皇都裡不斷轉化：

錄》第128冊，頁1997。

⁸⁴ [明]董應舉：《崇相集》（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二年〔1639〕王舜發校刻本），卷2，頁42a。

⁸⁵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頁327。戴九玄，江西新昌人，進士，生卒不詳。萬曆四十二年（1614）任文安知縣，後任工部員外郎。此詩的具體寫作時間不詳。

⁸⁶ 同前註。

⁸⁷ [清]汪楫：「崇禎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條，《崇禎長編》第9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年），頁1610。

將士的魂魄化成螞蟻；骷髏突然說話如同復活，而被它追逐的宦官難逃一死。南海子成為一處詭異離奇的場所，作為皇家機構，它不再威嚴、完美和安全。

奇跡異聞對文化記憶的塑造深刻而持續，它不僅告訴後人過去曾發生的事件，更通過奇異的情節和氛圍，傳遞各類人物和歷史主體的情感，並表達敘述者的評價和反思。〈皇姑寺〉、〈南海子〉兩篇文章代表了《景物略》的書寫策略：前者基於確定的歷史事件，對歷史細節進行改編；後者通過捏合資訊，充實人物形象，繼而創造「擬歷史事件」。在這樣的文學技巧下，個人的死亡與國朝事件結合，共同進入北京城的歷史敘述。遊離在日常經驗之外的人物——如皇帝、宦官、僧尼——成為這些故事的主角。在敘事中，他們的遭遇往往與重大歷史事件密切相關；雖然享有極高特權，但其兼具加害人和受害者的雙重身分，既令人生厭，又引人同情。劉侗不斷反轉情節，通過曲折的敘事探究人物行為背後曖昧的道德立場。在《景物略》的文本中，都城呈現詭異的末世氣象。人們的日常經驗被顛覆，衝突對立的生與死、鬼魅和人類、中原和北方遊牧他者在此頻繁相遇並發生互動。

四、評論與傳播過程中明末文化記憶的流變

從 17 世紀中期開始，《景物略》反復再版，幾度風靡閱讀市場。在重刊過程中，全書篇幅不斷縮減，所收的千餘首詩歌逐漸被剔除，部分文章被重新編輯。在不同時代背景下，後世編者／讀者以各自視角對《景物略》加以解讀，把這部寄寓國家興衰的作品轉化成無關政治的「純文學」小品美文。同時，圍繞本書的內容和語言風格，他們對明末歷史、竟陵文風和晚明世風進行種種評議。筆者認為，對都城文化記憶的不同態度導致了後世編者對《景物略》文本性質的多種闡釋。本節從 1635 年後發行的各版本《景物略》資料入手，梳理後世讀者對此書的回應，以此檢索明末都城文化記憶在帝制晚期和 20 世紀的流變。

1644 年春，北京城被李自成（1606-1645）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破，之後被清軍佔領，明朝正式結束了長達 276 年的統治。在明朝覆滅前不到一年，任職兵部的耿章光（生卒不詳，1637 年進士）、王永積（生卒不詳，1634 年進士）對《景物略》進行編輯整理。⁸⁸他們刪除崇禎八年初刻本中的全部詩歌以及方逢年序、于

⁸⁸ 日本內閣文庫藏耿、王兵部刻本的手抄本（1770）。抄寫者為日本江戶學者大田南畝（1749-1823）。該書最後一冊末頁有抄寫題記：「帝京景物略八卷，青山妙有庵所藏。明和七

奕正略例，僅留散文和劉侗原序，並添加汪偉（?-1644）、王永積新序，在兵部刻板刊印。

在二位編者看來，《景物略》「使名山國門兩存其業」，其最大的價值在於同時保留都城風景名勝和國朝歷史。⁸⁹劉侗作品的史學書寫意義在明朝行將滅亡之際，被讀者敏銳覺察。考編者生平，王永積與劉侗是舊識，二人同是 1634 年進士。他在序中提出，劉侗原序中對北京軍事地理的討論是「可悟汰兵法者」；全書又有「《春秋》之義」，二者交匯，可以識別作者之「譏」，即劉侗對世道的察問和規勸。王永積強調：「同人措辭命意，其點綴之妙，全在避實擊虛。」⁹⁰故此書不是簡單的遊覽娛情之作，而蘊含了作者的褒貶，需要讀者細心體察其中「虛」處。

在距離明亡甲申之變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王永積和耿章光身處北京城，對現實危難感到絕望。這本縮略版《景物略》被雜置在「夷情塘報」裡，困頓憂愁中的閱讀成為緬懷往事的時刻。王永積云：

逆奴內犯，主憂臣辱，中夜彷徨，而實愧無籌少裨。廟算羽書之暇，輒同耿子玄度取是書而審閱之。耿子愀然興嘆，謂同人緬懷當代所嘖嘖讚賞者惟是。⁹¹

引文中提到的耿玄度，即另一位編者耿章光。其父為天啟崇禎年間名臣耿如杞（?-1631，1616 年進士），曾因彈劾魏忠賢入獄。1929 年明清己巳戰爭時，耿如杞任山西巡撫。十一月，奉命帶兵入京勤王；十二月，由於朝廷調度問題，耿如杞的軍隊發生兵嘩事件，潰於良鄉。次年，耿入獄，後被處死。⁹²在追述耿如杞事蹟後，王永積悲歎道：

年庚寅（1770）仲夏七日借而繕寫。至八年辛卯（1771）初秋廿日業成。息偃館主人志。」

⁸⁹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第 1 冊（東京：日本內閣文庫藏大田南畝 1770 年寫本），頁 14a。

⁹⁰ [明]王永積：〈序〉，收入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第 1 冊，頁 17a-18a。

⁹¹ 同前註，頁 18b-19a。

⁹² [清]張廷玉等編：《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6 年），頁 6422-6423。

今且四入四利，將矯卒悍，視昔有加，九門之外，即為胡馬長嘶地。國家三百載養兵士之謂何？予則更念同人矣！⁹³

對於王、耿二人來說，父親、好友都已與世長辭，而國家和皇都危在旦夕。縱然《景物略》「可攜入行囊肩，可當帝城春樹譜，可當花市露布檄，可當郵筒行秘書」，⁹⁴但此時又有誰能外出遊覽京師山水？城門外已「胡馬長嘶」，讀者只能憑藉文本「臥遊」，想像都域名勝，緬懷昔日的安逸和平。

入清之後，明季遺民曾重刊《帝京景物略》，更用新名《燕京古跡》，徐乾學（1631-1694）《傳是樓書目》有記錄，但該版本現已失傳。⁹⁵據傳編者名為華方弱，生平無考，此版本的相關資訊保留在劉侗好友、著名遺民張自烈（1597-1673）的〈燕都古跡序〉。⁹⁶1665年前後，張自烈在江蘇崑陵一帶遊覽，偶然見到《燕京古跡》一書，與朋友「掩卷低徊，未嘗不相視嗚咽也。」張自烈稱，華子在明亡前決定刊刻劉侗《景物略》，但還未成行，「國社屋版隨以亡」，直到十年後，此書才得以刊發。談及書名更改一事，張自烈感慨道：

大一統則稱「帝京」，紀全勝則稱「景物」。固也。今幅員猶昔也，本其地云爾，故燕之景物非舊也，睹其概云爾，故跡之岸谷遞易也，古今一致云爾。⁹⁷

朝代更迭後，都城折射出的時空觀念值得我們注意。雖然疆域領土——即文中所稱的「幅員」——與昔日相同，但在明遺民的心中，景物已經不再是舊時樣貌，皇明大一統的全勝不再。張自烈的言外之意是，滿清的統治既非合法的「大一統」，也無「全勝」景觀，所以「帝京景物」四字不再適用於這部記錄皇明的作品。他們的拒絕姿態體現在對「燕京」和「古跡」二詞的使用中。與「帝京」相比，「燕京」一詞更加遠離政治意味，無關當前王朝的合法性；與「景物」相比，「古跡」

⁹³ [明]王永積：〈序〉，收入〔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第1冊，頁19b-20a。

⁹⁴ [明]汪偉：〈序〉，收入〔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第1冊，頁15a-15b。

⁹⁵ [清]徐乾學：《傳是樓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2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942。該書條目緊隨《帝京景物略》後。

⁹⁶ [清]張自烈：〈燕都古跡序〉，《芑山文集》（南昌：德廬書社，1916年），卷12，頁20b-22a。

⁹⁷ 同前註，頁21a。

一詞則清晰地指向了今昔之別。

考察清初遺民詩文，閱讀《景物略》一度成為文人憑弔前朝的方式。通過《景物略》而體驗的「臥遊」已不再是晚明盛行的閒情娛樂，而是無可奈何之中的追憶與哀悼。詩人蔣薰（1610-1693）曾評《景物略》云：

擬從天際結高樓，收拾名山作臥遊。
京洛歸來莫噫嘆，擁書猶識舊皇州。⁹⁸

1649 年後，清廷重新規劃北京城，實行滿漢隔離分居的政策。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城內建築空間不斷更改，滿漢人口比例發生顯著變化。在蔣薰看來，北京已經面目大變，只有在「擁書臥遊」的時刻，才有機會「識」得「舊皇州」。

在明清易代的社會變革中，1643 年兵部藏版和清初《燕京古跡》版凸顯了《景物略》一書承載的文化記憶的分量。明代的覆滅構成了編者們的生活底色，對王永積等人而言，覆滅是即將到達的未來，而對張自烈等人來說這是剛剛經歷的過去。編者們結合自身政治處境，反觀劉侗當年都城書寫的歷史意義。《景物略》一書成為他們懷想明皇都勝景的媒介，而重拾都城文化記憶則成為這兩個版本最重要的刊行目的。值得一提的是，伴隨著對前朝往事的追憶和反思，17 世紀中期的文學批評界開始對竟陵派的整體詩文創作進行政治化解讀。《景物略》代表的冷峻奇詭文風遭到了著名學者錢謙益（1582-1664）的攻擊。錢氏云：

其所謂「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獨君之冥語，如夢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國。浸淫三十餘年，風移俗易，滔滔不返。余嘗論近代之詩，扶擿洗削，以淒聲寒魄為致，此鬼趣也。尖新割剝，以噍音促節為能，此兵象也。⁹⁹

由明入清的錢謙益在經歷喪亂之後回顧明代文壇，提出竟陵派對明末世風的負面影響。他認為，「淒聲寒魄」和「尖新割剝」的文學趣味，致使士人偏離求學務實

⁹⁸ [清]蔣薰：〈讀劉侗帝京景物略〉，《留素堂詩刪》（北京：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卷 1，頁 31a。

⁹⁹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頁 571。

的道路，一味追求表面新奇，使得世風浮躁，間接導致了國家政治混亂和朝代滅亡。這一有失偏頗的觀點影響了清代學者對晚明詩文的整體評價，也被現代各類文學史著作頻繁引用。嚴迪昌（1936-2003）、嚴志雄（1963-）等學者已經深入討論了錢謙益對竟陵文風的貶斥，尤其分析了他攻擊鍾惺（1574-1625）、譚元春二人背後的歷史、思想動因。¹⁰⁰在此，筆者補充兩點對錢謙益觀點的解讀。第一、錢謙益對語言風格的關注，尤其對聲律、字法等文學技巧的分析，把《景物略》的文學品質確立成文學批評領域的關鍵問題，這一問題意識影響了清代乃至 20 世紀文學評論的關注點。第二、把竟陵文風比作「鬼趣」、「兵象」和「詩妖」，一方面奠定了清代對《景物略》所代表的晚明筆記的負面評價，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劉侗作品中文本與世風的密切關聯。筆者認為，在文本與世風方面，《景物略》與明末社會文化的關係並非錢氏所預設的因果邏輯。如果說竟陵文學冷峻的語言風格帶有某種「不祥」的「亡國之音」特性，那麼它也應更接近《禮記》原典的語境，即在喪亂之際作者心有所感，在困頓哀愁中做出「深幽孤峭」之文，而並非那獨特奇詭的文風導致了國家的滅亡，顯然這些作者不具備如此直接影響朝政的能力，也不應該承擔錢氏定下的「敗國之罪」。¹⁰¹

在錢謙益之後，清代讀者漸忽視劉侗的「春秋筆法」，幾乎不再有人評議文本中蘊含的史學思考和社會觀察。進入 17 世紀下半葉，《景物略》文本與明末特殊時代背景的關聯越發薄弱，早期版本中出現的追憶式閱讀消失，明末的「文化記憶」漸漸淡化。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最傑出的志怪作家——蒲松齡（1640-1715）和紀昀（1724-1805）——都極鍾愛此書，並都編寫選本。蒲松齡的 1684 年選本已佚，但紀昀的版本廣為流傳，在《景物略》的批評史和閱讀史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¹⁰²

¹⁰⁰ 參考嚴迪昌：《清詩史》（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47-50。嚴志雄：〈錢謙益攻排竟陵鐘、譚新議〉，《牧齋初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1-42。Chou, Ch'i-ping, *Yü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18.

¹⁰¹ 「亡國之音」出自《禮記·樂記》：「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978。嚴迪昌亦對此觀點有所說明，參考嚴迪昌：《清詩史》（上），頁 50。

¹⁰² 有關蒲松齡選本的信息，參考〔清〕蒲松齡：〈《帝京景物略》小引〉，《蒲松齡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53。蒲松齡不僅欣賞劉侗的文筆，還在自己的文學創作中借鑒《景

1766年，紀昀丁憂離職歸家，長夏無事，閱讀《景物略》。他為此書所作的兩篇序看似充滿批評，但實際上隱晦表達了欣賞和喜愛。一方面，紀昀指出，以《景物略》為代表的晚明書籍體例猥雜，「非邑志而有邑志習，非詩社而有詩社習」，內容「連篇累牘」，點校版刻均不精。¹⁰³他還延續了錢謙益對竟陵文風的批判，認為這些「詭俊纖巧之詞」是明末世風輕佻的產物。¹⁰⁴但另一方面，雖然對《景物略》和晚明出版文化頗有微詞，紀昀依舊肯定了該書的文學品質是不容埋沒的：

其胚胎，則《世說新語》《水經注》；其門徑，則出入竟陵、公安。其序致冷雋，亦時復可觀。蓋竟陵、公安之文，雖無當於古作者，而小品點綴，則其所宜。寸有所長，不容沒也。¹⁰⁵

因為《景物略》文章「序致冷雋」、「時復可觀」，所以紀昀「芟夷翳色」：刪除全部詩歌，修訂散文文本，把全書重新編輯整理成兩冊付梓。這樣一來，紀昀稱：「穢雜既除，神志開朗，逐處延賞，頗足流連。」引文最後兩句尤其值得注意。紀昀在此先抑後揚，先稱竟陵之文無法與古人名作比肩，轉而讓步說到即使《景物略》只是點綴文壇的「小品」，也依舊有自己的優點。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故此書實在值得一讀，不可就此埋沒。

筆者認為，紀昀 1766 版序中的微詞和大規模刪正行為恰恰是為確保《景物略》順利流傳而做出的努力。¹⁰⁶18 世紀以來，在文字獄的恐怖氣氛中，伴隨清廷對書

物略》的內容。《聊齋志異》名篇〈促織〉就以《景物略》的〈胡家村〉一文為參考。學者孟昭連對此已詳細考證，此處不再贅述。孟昭連：〈〈促織〉與《帝京景物略》〉，《齊魯學刊》2000年第3期，頁44-49；〈〈促織〉創作中的借鑒與疏漏〉，《蒲松齡研究》第2期（1992年7月），頁50-60。

¹⁰³ [清]紀昀：〈刪正《帝京景物略》序〉，《紀曉嵐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164。

¹⁰⁴ 同前註。

¹⁰⁵ 同前註。

¹⁰⁶ 大部分學者認為紀昀大刀闊斧修訂《景物略》表現了清代館閣文臣的「保守和狹隘」。但學者樂保群在 2013 年新出版的《帝京景物略》一書的介紹中指出「紀昀的刪正出於對此書的特別偏愛」，他認為，因為《四庫全書》未收錄《景物略》，所以紀昀決定自己刊刻。筆者認為樂保群的觀察總體正確，但其解釋在時間邏輯上並不準確，此書的刊行早於四庫的編

籍的嚴格審查，書籍作者和編者均呈現出「自我壓抑」的趨向，開始有意識地對出版物進行自我審查。¹⁰⁷在 1766 年編輯《景物略》前，紀昀已經擔任多項朝廷史館的書籍編修工作，他深知，像《景物略》這樣一部記錄明末都城文化風貌的作品內容十分敏感，其傳播與發行很可能會招致災禍，最終導致此書的散佚。¹⁰⁸於是在序言中，紀昀反復強調劉侗作品只是「小品」，無關「大道」。雖然沿襲了錢謙益對竟陵文風的負面評價，但仔細檢查經紀昀編輯後的文本就會發現，劉侗的「詭俊纖巧」之詞得以完全保留。原書中描寫冷峻山水和奇蹟異聞的段落沒有任何刪減，而被剔除的是明顯與明代時政有關或與清廷文化政策相違背的內容，如〈太學石鼓〉篇中對明代太學制度的歌頌、〈首善書院〉中對心學概念的闡釋，以及記載李贄（1527-1602）生平的〈李卓吾墓〉。¹⁰⁹

1773 年，《四庫全書》工程在紀昀等官員的主持下啟動。在《總目提要》中，《景物略》被列入存目。四庫館臣對此書的評價極低，他們認為《景物略》文辭「纖詭」，「么弦側調」，內容「殊傷冗濫」，違背地志體例。¹¹⁰在此，我們觀察到紀昀文學批評的多面性。作為四庫館臣，他對竟陵作品加以貶斥；但作為志怪文學的愛好者、《閱微草堂筆記》的作者，他又私愛《景物略》，明貶實褒。紀昀的細校和編訂，加之個人的文名和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景物略》的流通。紀昀曾言：「他時倘有餘貲，以此本刻之，或以廓清為刪者功，未可知也。或此本竟漸行，原本竟隱，使人知有詩而不得矣。」¹¹¹這部刪節版因其內容精簡，在清中葉以降的書籍市場中佔據主流位置，代替了詩文合集的初刻版。直至 20 世紀中葉，其影響力仍舊不減，1957 年古典文學出版社和 1979 年世界出版

纂。參考〔明〕劉侗、于奕正著，樂保群編：《帝京景物略》（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 年），頁 11。

¹⁰⁷ 有關清代文字獄及其在出版界和思想界的影響，尤其是在此背景下作者和編者的「自我壓抑」和自我審查，參考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社，2013 年）。

¹⁰⁸ 1759 年，紀昀任功臣館總校；1761 年，任方略館總校；1764 年參與《大清一統志》等重要朝廷典籍工程。參考賀治起，吳慶榮著：《紀曉嵐年譜》（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 年），頁 30-44。

¹⁰⁹ 在序言中，紀昀列出了自己的修訂之處。〔清〕紀昀：〈刪正《帝京景物略》序〉，《紀曉嵐文集》，頁 164。

¹¹⁰ 〔清〕紀昀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 673。

¹¹¹ 〔清〕紀昀：〈刪正《帝京景物略》序〉，《紀曉嵐文集》，頁 164。

社所刊《帝京景物略》即以紀本為底本。

錢謙益、紀昀等清代學者對竟陵派的評價影響深遠，在後世被不斷徵引；評論者隱晦的偏愛不再被理解，而負面批評被不斷放大。到 20 世紀 30 年代，清代文人對晚明散文的負面評價已成為新文化運動後現代知識分子的攻擊目標。以周作人為代表，他們回顧公安、竟陵這些明清「正統」之外的文學流派，從中找尋中國文學現代性的本土根源；同時，進一步定義並固化「小品文」體裁概念，強調明清散文作品的純文學性和藝術審美價值。在此背景下，《景物略》再度受到關注，全本和選本均被重新刊行。¹¹²但其中的明末歷史記憶徹底消失，文學價值的主導地位越發突出。明清易代之際的「追憶式閱讀」和後來的「文學式閱讀」彼此滲透，看似矛盾，實則一脈相承。「文學式閱讀」的興起，部分源自對「追憶式閱讀」的主動規避。清代編者把《景物略》從明末歷史背景中剝離，弱化文本與特定歷史時代，尤其是與前朝政治背景的聯繫。這一評論策略既是基於 18 世紀嚴苛文本審查做出的調整，又為 20 世紀的文學理論討論提供了基本的思想資源。

五、結語

「詩言志，文載道」曾是中國古典文學創作的理想準則。1932 年，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中提出，明清時期無關「志」與「道」的「小品文」因其關注語言的藝術表現力，直抒作者情懷，不囿於道德教化之功用，應被視作中國文學現代性的本土起源之一。¹¹³這個觀點持久影響了我們今天對明清散文筆記的認識。在明末成書之際，《帝京景物略》是劉侗等作者感懷國家興衰之作，這一點曾在明清易代之際的讀者當中引起共鳴。1630 年代以降，位於國家邊境的首都北京面臨種種日益嚴峻的社會問題。明末作者對已有文獻進行整理，對城內各場所進行調查，創作了當時最完備的北京城市筆記，以此回顧都城的歷史，保留與都城相關的文化記憶。身處王朝衰落過程之中，劉侗等人生活經驗的時空結構使《景物略》有別於《洛陽伽藍記》、《武林舊事》等城市專書。《景物略》的寫作策略也不再是平鋪直敘，其文本性質也不是「透明」的事件記錄。通過改

¹¹² 1932 年，沈啟無選編《近代散文鈔》，收錄《景物略》散文 11 篇；1935 年，施蟄存編《晚明二十家小品》，收錄《景物略》散文 16 篇；同年 11 月，第一版現代排印《帝京景物略》由上海雜誌公司出版，由阿英（錢德富）編輯，以 1635 刻年初本為底本。

¹¹³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頁 26。

寫和編輯，劉侗把個人情感和對過去的批評反思融入文本。城市專書的書寫傳統在明末得以更新，出現了類似「當代史」的批判性寫作模式。

《景物略》的書籍特徵在後世流傳中發生顯著變化，初刻本中的詩歌被逐步剔除，散文漸占據主導地位。冷峻奇詭、高度詩化的散文語言成為該書的首要特徵。同時，圍繞劉侗作品的討論體現了不同時代學者對竟陵派文風的理解。從清代的貶抑到 20 世紀的褒揚，隱藏在文學批評史之下的是一條自晚明至民初的思想脈絡。文學批評與政治批評的關係始終以多變、微妙的方式緊密聯結。就《景物略》而言，其冷峻風格的達成與隱晦諷刺的敘述策略受明末政治環境影響；而對這一風格或貶或褒的回應又與後來各時代的文化潮流緊密相關，從盛清對文字獄的規避到 20 世紀對「現代性」的追尋。在這個過程中，《景物略》不斷「小品」化、「純文學」化，晚明作者對明朝興衰的憂慮不再為讀者關注。

徵引書目

〔傳統文獻〕

- 〔戰國〕莊子著，〔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年。
- 〔晉〕葛洪：《抱樸子》，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明〕王同軌：《耳談類增》，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刻本唐氏世德堂刻本。
- 〔明〕王崇簡：《青箱堂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03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
-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6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明〕金鉉：《石臼集》，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 〔明〕商淩編：《異聞總錄》，收入《稗海全書》，廣東：中山圖書館藏清康熙振鷺堂據明商氏刻《稗海》本重編補刻本。
- 〔明〕馮夢龍：《笑史》，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9年。
- 〔明〕董應舉：《崇相集》，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二年（1639）王舜發校刻本。
- 〔明〕蔣一葵：《長安客話》，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第1冊，東京：日本內閣文庫藏大田南畝1770年寫本。
- _____：《帝京景物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7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_____著，樂保群編：《帝京景物略》，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年。
- 〔明〕馬愈：《馬氏日鈔及三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 〔明〕凌義渠：《凌忠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97冊，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清〕方以智：《方子流寓草》，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清〕朱彝尊：《日下舊聞》第1冊，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藏42卷本。

〔清〕汪楫：《崇禎長編》第9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年。

〔清〕周亮工：《書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清〕施閏章：《學餘堂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313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_____：《紀曉嵐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清〕徐乾學：《傳是樓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2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清〕張廷玉等編：《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6年。

〔清〕張自烈：《芑山文集》，南昌：德廬書社，1916年。

〔清〕蒲松齡：《蒲松齡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清〕蔣薰：《留素堂詩刪》，北京：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清〕鄭慶華等修，〔清〕潘頤福等纂：《麻城縣誌》，光緒二年刻本。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神宗實錄》第114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年。

_____：《明實錄·熹宗實錄》第125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年。

_____：《明實錄·熹宗實錄》第128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年。

_____：《明實錄·熹宗實錄》第129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年。

〔近人論著〕

-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社，2013年。
- 王燦熾：《燕都古籍考》，北京：京華出版社，1985年。
- _____：〈《帝京景物略》及其作者考〉，《北京社會科學》第4期，2006年8月，頁54-60。
- 何孝榮：〈論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成大歷史學報》第30號，2006年6月，頁139-177。
- _____：《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年。
- 李建英：〈《帝京景物略》中北京民俗敘述——以元宵節為例〉，《漢字文化》第5期，2017年3月，頁82-84。
- 吳承學：〈《帝京景物略》與竟陵文風〉，《學術研究》第1期，1996年1月，頁73-76。
- _____：《晚明文學思潮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 _____：《晚明小品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
- 邱仲麟：〈繁華如夢：明代士人記憶中的三大市〉，收入陳平原、王德威編：《北京：城市想象與文學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 孟昭連：〈〈促織〉創作中的借鑒與疏漏〉，《蒲松齡研究》第2期，1992年7月，頁50-60。
- _____：〈〈促織〉與《帝京景物略》〉，《齊魯學刊》2000年第3期，頁44-49。
- 孟森：《明清史講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侯仁之：《北京城市歷史地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 祝良文：〈《帝京景物略》作者補考〉，《武陵學刊》第3期，2013年5月，頁104-107。
- 張永剛：《東林黨議與晚明文學活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 張勃：〈《帝京景物略》中的歲時民俗記述研究〉，《民俗研究》第4期，2010年12月，頁77-92。
- 陳玉女：〈明嘉靖初期議禮派權與佛教肅清：以皇姑寺事件為考察中心〉，《明代的佛教與社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 陳廣宏：《竟陵派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
- 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 賀治起、吳慶榮著：《紀曉嵐年譜》，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年。
- 景愛：〈京西皇姑寺明代石刻叢考〉，《出土文獻研究》2005年第7期，頁381-391。
- 黃鳴：〈《帝京景物略》的世界——劉侗的情感空間〉，收入《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會議論文集》，武漢：武漢大學，2008年。
- 賈琚：〈《帝京景物略》園林論述析讀〉，《建築史》第3期，2012年12月，頁99-113。
- 鄔國平：《竟陵派與明代文學批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趙一澧：〈明代北京南苑考〉，《呼倫貝爾學院學報》第3期，2005年6月，頁5-8。
-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收入《鄭振鐸全集》第9冊，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
- 劉永安、劉庭風：〈《帝京景物略》中官宦私家園林代表——清華園研究〉，《建築與文化》第3期，2016年3月，頁218-219。
- 劉洋：〈試論劉侗《帝京景物略》的寫景視角〉，《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頁129-131。
- 劉海霞：《中國古代城市筆記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
-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 嚴志雄：《牧齋初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年。
- 嚴迪昌：《清詩史》（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
- Assmann, Jan.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Chou, Ch'i-ping. *Yü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Feng, Naixi. "Mushroom Cloud in the Northern Capital: Writing the Tianqi Explos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ate Imperial China* 41.1 (June 2020): 71-112.
- Hargett, James. *Jade Mountains & Cinnabar Pools: The History of Travel Literature in Imperi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8.

- Laughlin, Charles. *The Literature of Leisure and Chinese Modernity*.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 Levine, Ari Daniel. "Welcome to the Occupation: Collective Memory, Displaced Nostalgia, and Dislocated Knowledge in Southern Song Ambassadors' Travel Records of Jin-Dynasty Kaifeng." *T'oung Pao* 99, nos.4-5 (2013): 379-444.
- Levine, Ari Daniel. "Walls and Gates, Windows and Mirrors: Urban Defenses, Cultural Memory, and Security Theatre in Song Kaifeng."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39 (2014): 55-118.
- McDowall, Stephen. "History, Temporality, and the Interdynastic Experience: Yu Binshuo's Survey of Nanjing (ca. 1672)."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8 (2018): 307-38.
- Nora, Pierre.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1989): 7-24.
- Naquin, Susan. *Peking: Temple and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0.
- Owen, Stephen. *Remembrance: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West, Stephe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Dream: the Sources, Evalu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Dongjing menghualu*." *T'oung Pao* 71 (1985): 63-108.
- Zhu, Jianfei. *Chinese Spatial Strategies: Imperial Beijing, 1420-1911*.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Urban Miscellany of Late-Ming Beijing and the Cultural Memory of the Capital: Centering on the Creation, Comment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A Sketch of Sites and Objects in the Imperial Capital*

Feng, Naixi*

[Abstract]

Published in 1635, *A Sketch of Sites and Objects in the Imperial Capital*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urban miscellanies from late imperial China, recording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Beijing. Written by scholars without governmental sponsorship, it systematically records the capital's famous scenic and historical sites, social customs, and local products. It was the largest and latest work on Beijing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book enjoyed great reputation in the literary world for its densely poetic style and was later venerated as the classic of Ming-Qing "vignette" (*xiaopin*) literature. After examining the special geo-political position of Beijing as well as the authors' motivation and the writing process, it becomes clear that *A Sketch of Sites and Objects in the Imperial Capital* has the dual quality of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prose literature, showcasing the convergence of literary creation and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concluding years of one dynasty. The authors of *A Sketch of Sites and Objects in the Imperial Capital* reviewed dynastic history through adapting and rewriting strange tales, and in the meantime, expressed their critique on reality and the anxiety over the future. However, during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ook from the late Ming onward, its later critics reshaped the form and reinterpreted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based on their own contexts. Thus, the cultural memory of the capital and the authors' critical voices on

* Assistant Professor, Tsinghua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history faded. The book was finally transformed into “vignette,” familiar to contemporary readers.

Keywords: Beijing, Urban Miscellany, the Jingling School, Cultural Memory